

李济深的“一号提案”与政协提案工作

刘佳义

今年是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五十周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是世界上的一个大事件,也是联合国的一个大事件。这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标志着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不禁使我们想起新中国成立时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想起在这个会上,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杰出的政治家和革命家李济深等同志提出的人民政协一号提案。



李济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签到

人民政协的“一号提案”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在会上,李济深、郭沫若等44人联名提出了《请以大会名义致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这件提案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能代表中国人民之政府,应由政府发出声明,否认伪国民党政府所派出席联合国会议所有代表的代表资格。”提案在热烈的气氛中获得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交中央人民政府执行。

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实行代表制,会议所执行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一号提案”采用“交中央政府执行”的处理办法不仅直接体现了其沉甸甸的分量,也从侧面反映出其性质不同于之后委员制政协的提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件提案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它向世界表明: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来临!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不但站起来了,而且将以自己的力量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不懈的贡献!

人民政协“一号提案”提出22年后,1971年10月,纽约时间25日晚上,第二十六届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合法席位,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中国政府和毛泽东决定,迅速组建中国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代表团参加本届联大会议。很快,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代表团在一周内组成前往纽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正式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

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人民政协事业包括提案工作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从“一号提案”到现在,全国政协委员共提出14万多件提案。

2019年11月1日,全国政协作出决定,表彰全国政协成立70年来有影响力的重要提案共100件,人民政协“一号提案”当之无愧名列其中。全国政协的表彰决定指出:提案伴随人民政协和新中国的诞生而产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始,广大政协委员通过提案履行职能,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一号提案”到现在,政协提案工作走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同时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对政协工作包括提案工作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需要坚持好、继承好、发扬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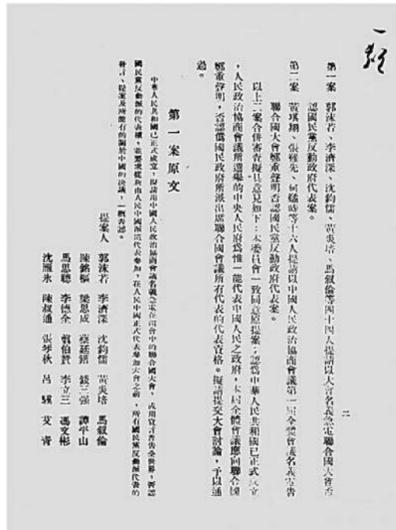
坚持党的领导是提案工作的根本保证

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政协成立时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初心和共识。抗战胜利后,除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外,中国还有一些党派是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就是学习英美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使他们警醒,中国人民革命实践让他们得出结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1948年1月1日,因反对蒋介石独裁、支持团结抗日,曾三次被蒋介石“永远开除国民党党籍”的李济深在香港倡导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继续为促进国内和平与民主而努力。同年5月5日,他发表通电,代表民革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表示拥护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完全赞同关于“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倡议。12月,应中共中央邀请,李济深突破重重困难,离开香港北上,到达解放区,以新的姿态投身新政协会议的筹备。

目标已定,新中国成立前后需要筹备的各项大事,成为李济深此时思考的重要问题,而争取国际上对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一号提案”产生的背景。

70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对政协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提案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共中央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提案工作的重要文件,为提案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做好提案工作,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提案工作全过程,切实落实中共中央对人民政协工作特别是提案工作的各项要求,担负起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



人民政协的第一件提案——《请以大会名义致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提案工作的基本原则

提案不只是政协参加单位或委员提出的书面意见,它的另一头连着的是党和人民的利益大事。提案者只有胸怀国之大者,自觉融入党和国家发展大局,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之前,李济深接受了包括美联社、英国《德西西报》在内的多家西方媒体的采访,重点宣传和介绍了新政协作用,号召更多的人参加新政协。为新中国成立后能够迅速争取国际上的广泛承认、顺利参与到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各项事务,李济深默默地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做着各项准备。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和平攻势发表了《关于局势的声明》,李济深与其他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表示热烈支持。他与沈钧儒、马叙伦等已到达解放区的55人,于1月22日联合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就召开新政协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2月3日,他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愿以自己一切言论和行动密切配合中共的政策和主张。此后,李济深在积极配合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同时,开始深入细致地思考新中国应如何开展外交工作等问题。1949年5月,他致函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外交问题在掌握独立自主之原则时,应注意运用之适当。可见,此时的他已开始思考和酝酿《请以大会名义致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的内容。

70多年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已经成为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基本准则,也是政协提案工作的基本方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做好今年的提案工作,意义更加特殊。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汇民意、聚智慧,助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影响现实的利益问题,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要紧扣“十四五”开局之年党和国家的重点任务,聚焦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提出更多有见地、有价值的真知灼见,使政协提案工作成为科学民主决策非常宝贵的“信息源”和“智慧库”。

坚持建言献策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是提案工作的重要着力点

政协委员提出提案,不是简单地编词作文、闭门造车,而是一个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实践

——认识——再实践的过程。办理提案也不是简单的“我交你办”“我办你看”的单向过程,而是深入协商、凝聚共识的过程。

人民政协“一号提案”的提出是广大民主党派成员多年实践的总结,是广泛凝聚共识的成果。正如李济深北上前写的《团结建国》元旦献词所说的:“一切民主阵线的朋友,爱国的人士,到今天,应该多多准备其知识能力,为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可见,一号提案在当时的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之中,起到团结的旗帜、前进的号角的作用。

70多年来,人民政协继承了李济深等老一辈民主人士的精神,把凝聚共识贯穿提案工作各环节全过程,充分发挥提案工作在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中的作用。全国政协制定的《关于加强和促进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要在提案办理中凝聚共识,提案提出、立案、办理、督办、评选、表彰等工作,都要通过有效措施,促进提案者、政协组织、承办单位等达成共识”。

近年来,各承办单位普遍把沟通协商作为提案办理的必经环节,把凝聚共识寓于提案办理协商之中,注重与委员的沟通联系,很多部门要求与提案者的沟通率达到100%,对重点提案要求必须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协商。各承办单位认真总结经验、互相学习借鉴,加强提案办理过程中的协商互动,既通过“人来人往”当面沟通,也注重通过视频连线、电话沟通等方式同委员深入交流,耐心细致地做好说明解释工作,做到提案办一件、协商深一层、共识增一分,达到提得认真、商得深入、办得满意的效果。

坚持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改革创新是提案工作的内在要求

人民政协“一号提案”是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脉搏,追求真理规律的成果。这对我们这些人写好提案具有重要启示。

政协委员提出提案,实际上是做“立论”工作。中国历史上很多有识之士为国家大计上书建言,有的在当朝当代就被采纳,也有的对后人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孟子、荀子、韩非子,他们的著作很大一部分就是对当时领导者的进言。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名篇佳句,有不少出自历代的“疏”“表”“策”“论”。延安时期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立言就是对某个重大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反复论证,提出“一家之言”,提出一些论点。从一定意义上讲,立言也就是立论,提提案做的就是立论工作。政协立法,但可以立论。如果我们每年都能提出若干有价值的提案,为解决国家和民族当前和今后重大问题提供意见建议,在立论上有所贡献,那就是成就,就是尽职尽责。政协委员作为各界的代表人士,知识分子居多,具有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政协委员从来就有一种使命感、责任感,他们涵养着知识分子的学养风骨、底蕴气质,怀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怀,通过提案等政协经常性工作,履行职能责任,助力国家发展。

作为全国政协第一届至第三届副主席,李济深先生对人民政协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们这里虽然只是回顾总结他提出第一号提案的经过、国内外的重大政治影响以及对政协工作的贡献,但“一滴水能见太阳的光辉”。每当我读到这个历经22年的提案故事时,总觉得被一些东西感动着:先生的胸怀是那么地宽广,眼光是那么地高远,精神是那样地坚韧和刚毅。这是政协委员的风骨,是他的职责和使命。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共和国这座宏伟大厦,凝聚着一届又一届政协委员的心血和汗水;共和国的辉煌业绩,与人民政协历史上一大批闪光的名字紧密相连。作为这个组织的成员,作为他们的后来人,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人民政协事业接过来、传下去,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北京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梁宗岱向来好争辩。1937年3月,他在《宇宙风》杂志第36期上,发表《从滥用名词说起》。文章批评了他的两位好友,指出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中说贝多芬的《月光曲》“温柔委婉,如怨如诉”,这属于望文生义,因为贝多芬原本表现的是“一个热烈的灵魂和外面的狂风甚或旋风挣扎的月夜”。还有李健吾《咀华集》评价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说读《岩》好像“谛听一段生风尼(交响乐)”,显然也不准确。

对此,朱光潜没有回应。李健吾却写了《读〈从滥用名词说起〉——致梁宗岱先生》的长文,发表于当年4月2日《大公报·文艺》。他承认“生风尼”确系用词不当,但梁宗岱自己也滥用名词。

4月28日,梁宗岱又在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从滥用名词说起〉底余波》,副题“致李健吾先生”,文中还涉及梁实秋和巴金。因梁实秋在

沈从文当和事佬

刘浪

《论文学的美》中说,“美学的原则”可应用到图画音乐,偏偏不能应用在文学上,遭到梁宗岱的揶揄和痛骂。同时,梁宗岱表示,他赞成朱光潜对达·芬奇《最后的晚餐》是油画的论断。

一个多月后,巴金在上海的《中流》杂志上发表《给朱光潜先生》,证明《最后的晚餐》并非油画,而且朱光潜关于“世纪病”的翻译很不恰当。

眼看论争变得越发针锋相对。6月30日,沈从文用笔名“上官碧”发表《滥用名词的商榷》一文,以和事佬的姿态,提出两个观点,作为总结:一是滥用名词不可避免,不应过于苛责,即便要批评,双方也应心平气和地,不能像梁宗岱那样“吵吵嚷嚷”;二是个别名词的使用不当,不会决定文章的整体成败,但首先写作态度必须是诚实的。至此,这场论争才逐渐平息。



季羨林的拳拳之心

崔鹤同

2001年夏天,季羨林的亲炙弟子张保胜到北大朗润园看望季先生。季羨林拿出《永乐大钟铭文真迹》一函,问张保胜对蓝礼体梵文有没有兴趣,张保胜看了激动不已。季羨林遂命令张保胜承担大钟梵文的解读和诠释任务。张保胜欣然领命,并请恩师季羨林担任特约顾问。

季羨林慧眼识人,张保胜在梵文的研读方面下过工夫,也颇有建树。季羨林相信他可以完成这项艰难的任务,解开这座有近600年历史的佛钟的奥秘。而这座大钟梵文的解读,对陀罗尼的研究,对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都具有重要意义。

张保胜从解读和考据等不同的八个层次展开,废寝忘食,孜孜以求,如同沧海觅粟。季羨林也对此倾注了大量心血。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研究初见成效。2001年11月

19日,天气阴冷,北风呼啸。张保胜在大钟寺现场讲解梵文陀罗尼,90岁高龄的季羨林不顾众人劝阻,坚持坐在寒风里,认真听了两个多小时。那时他已患病,只是不动声色,在那里硬撑着,12月9日就被送进301医院。

事后他的亲传子弟梁志刚心疼地对季羨林说:“就是为张保胜站脚助威,也没有必要在那里冻两个多小时呀。”

季羨林回答说:“有必要。因为他讲的有些新东西,有的我还不了解。”一句“有必要”,不仅是对张保胜的鼎力支持,也彰显了季老对待学问和学生的一颗谦逊而又诚挚的拳拳之心。

2006年,在张保胜的不懈努力下,在一些专家学者的热情帮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保胜的重要专著《永乐大钟梵字铭文考》一书,季羨林满怀深情,欣然命笔写序祝賀。



徐特立断指血书激励学生

叶松

人民教育家徐特立是温和宽厚、慈眉善目的长者,很少有人知道他义愤填膺、挥刀断指的壮举。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还特意写到徐特立与封建政治作斗争的标志——“诚意割去的小指头”。

徐特立断指血书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甲午战争以后,许多不法的外国传教士嚣张跋扈、为非作歹,一些中国教徒也仗势欺人、鱼肉同胞。民众遇到不法侵害时,常常有理难说、有冤难申,甚至因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剧,人民群众的反对爱国情绪日益高涨,全国各地也不断上演中国人民同外国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

1909年12月8日,徐特立以校董兼教员身份在长沙修业学校向全校师生作时事报告。他痛陈教案实情:“现在的满清政府,极是软弱无能,害怕洋人,巴结洋人,采用的政策完全是恨外媚外。而帝国主义凶恶之气息,一天甚似一天。老百姓不堪忍受,被迫起来反抗,以至酿成教

案。但不管在哪里发生教案,吃亏的却总是我们中国人民。因为政府不但不能保护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利益,反而处处为洋人张目,为虎作倀。”他还勉励学生:“要把救国的担子挑起来。义之所在,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要向帝国主义报仇雪耻。”

讲到激动之处,悲愤之情难以自己,徐特立和学生都痛哭起来。忽然,徐特立从台上跳下,跑到厨房,拿出一把菜刀,当场将左手的一个指头砍断一节,用殷红的鲜血书写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8个大字,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激励青年学生反帝爱国。

在徐特立的带动和影响下,一大批青年学生先后走上救国救民之路。这一时期,徐特立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之中,创办学校、培养人才,尽心尽力教育青年一代,希望他们能够改变国家命运。五四运动爆发后,徐特立还同青年学生一起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异国他乡苦学救国本领。



启功题写校训

夏明亮

1997年,为纪念建校95周年,北京师范大学决定面向全校师生公开征集校训。校领导发现1993年启功曾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书写的题词“师垂典范,示范群伦”,认为这8个字既寓意深刻,又贴近师范大学的办学特色,建议作为校训。

启功却觉得这8个字一来嫌显深、不够通俗,二来稍感平板、过于静态训释,作为校训不合适。几天后,启功又向学校提交了很不同的题词。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确定为校训。

校训一经公布,立即得到全校师生的认同。这8个字不仅更加平易通俗,而且更加深刻蕴藉。它不仅紧扣“师范”特色,而且蕴含了学与行、理论与实践、做学问与做人、做一般人和做教师之间的辩证关系。随后,学校领导敦请启功题写校训,启功欣然应命。但他特别强调:“校训之撰,当属学校。校训碑正面右首当署‘北京师范大学校训’”落款则是启功“敬”书,表明在校训面前,启功只把自己当成学校的普通一员。

后来,学校有关部门多次请启功阐释所题校训的意义,启功每次都以“学习校训,理解如此”的口吻来写,从不把校训当作自己的创造而专有。一次,在学生们的强烈要求下,启功总结了他对校训的理解:“所学,足为后辈之师;所行,应为后人之范。”他进一步解释,“学,是指每位师生应具有的学习、知识以及技能,仅仅‘具有’还不够,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是要能够成为后学的师表;行,是指每位师生应有的品行,包括思想、行为、待人、对己,方方面面,时时刻刻,都光明正大,能够成为世界上、社会中的模范。这种模范,不是等待别人选举出来,而是自己随时扪心自问,有没有可惭愧的思想行为。校训没有任何人执行考试、考察、评判、评选,但是每位师生,都生活在自己前后左右无数人的雪亮公平的眼睛中。”

启功一生以书法大家、诗词大家、文物鉴定家和著名学者等多种名衔闻名于世,但他最看重的却是教师的身份。“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8个字,既是启功一生从教的实践经验总结,也是他一生70余年教师生涯的真实写照。